

山... 日... 一... 道... 高... 里... 法... 在... 往... 行... 轉... 風... 為... 景... 佳... 而...  
... 室... 漸... 展... 後... 山... 百... 二... 十... 日... 子... 刻... 集... 乃... 蘇... 東... 也...

冯其庸著

# 逝川集

己巳年  
冬  
月  
六  
日  
冯其庸



逝川集

冯其庸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9.875 字数213,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0094·242 定价：1.00元

封面画：齐白石

封面题签：朱屺瞻

扉页题签：王遽常

封面设计：王艺光

## 序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是我在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间写的有关古代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的论文的一部分，有关戏剧方面的论文，已另外编集，没有放在这本集子里，以免庞杂。

我只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对文学史则更是所知甚少。我的青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抗战爆发的那年，我还在小学五年级，当我背着书包从农村走到镇上上小学时，就遇到日本飞机在头顶上散发传单，传单的句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暴蒋握政权行将没落”。当我走到学校时，学校已关门，老师已走散，我已无学可上了，因为我连续病了好几天，没有到校，学校如此的变化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书包里还借了图书馆的一部《三国志演义》，也没有地方可还，从此这部书便成了我的文学教科书。之后，我又借到了《水浒传》、《荡寇志》、《西厢记》、《夜雨秋灯录》、《阅微草堂笔记》、《池北偶谈》等书，特别是不知从哪里借来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没有封面的古诗，只记得里面有《古诗十九首》这些诗，后来回想，大概是《古诗源》。我在农村失学后，就似懂非懂地读着这些书，直到几年以后，才上了镇上的农村中学。然而，我还是爱读这些书，没有想到，就是这几部书，牢固地培养了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直到现在，我仍旧贪婪地爱读古典文学的各种名著。我深深感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传统是光辉灿烂的。可是我当时只上到高中一年级就失学了，当了几年小

学教师后，又在抗战胜利的第一年上了无锡国专，这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了。解放前一年，我从学校毕业后，仍旧贪婪地爱读这些古典文学著作，当然，这时我的读书领域已经扩充了许多，然而，对于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典籍，我们读的书，仍只不过是太仓之一粟而已。

解放以来，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已经快三十年了，但是我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古典文学的理解，仍然还是一个水平不高的学生。“学然后知不足”，确实，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原有的丰富典籍，已经使我有如观大海之浩淼，摸不着边际；近二十年来的地下发掘，更使我感到有如打开了千百座地下博物馆，里面放射着奇光异彩，和拨动着奇妙的琴弦，发出了二千年前历史的回声。

我在学习前人和今人所写的文学史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启发，也促使我经常思考一些问题。

文学史，它首先应该是属于“史”的范畴。因此，对文学史的了解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取决于对各该时期的历史了解的程度。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它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孤立的存在与发展，它是通向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它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各个方面，社会的一切生活方面，紧密地联系着，相互制约着，影响着。文学，只是这个时代的多面体的一个“面”，要了解文学的这个“面”，就必须去了解这个多面体的另外的一些面。因此我想，文学史，就其分工的专职来讲，它可以专讲文学的这个“面”，但就其要透彻地了解这个“面”的底细来说，就其治文学史的方法论来说，还必须同时去了解其他相关的各个“面”，其中尤其是经济、政治、哲学、艺术、宗教这几个“面”。这

样，在治文学史者的心目里，就不是形而上学地片面地存在着文学的这个“面”，而是形象地、立体地存在着这个历史的多面体了。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然从根本来说，它是—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是受经济基础的制约的。但这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的总体来说的，是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说的；如果就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或某一特定的文学形式来说，它往往受政治的影响来得更为直接和明显。试观我国的文学史，无论是屈原的《离骚》也好，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也好，也无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乃至于关汉卿的《窦娥冤》这类的剧作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类的小说，有哪一个作家或作品不是与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联的呢？甚至于我认为连陶渊明的隐逸，也是特定时期政治斗争的产物，无怪乎有人说陶诗是“二分梁父一分骚”了。因此在研究文学史时，这种各该时期的社会政治斗争，也即是阶级斗争，不能不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重要方面。恩格斯说：由于马克思对法国历史的精湛知识，他才能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样不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才能对这一历史事变描绘出如此精确的无与伦比的图画来；我认为研究文学史，同样需要这种对历史的精湛的知识，即对各该历史时期的各个历史“面”的透辟的了解。

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的繁荣时期，往往也是社会经济的繁荣时期，这是基本的一般的规律，但这并不是唯一的规律。建安时期的七子，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唐代的杜甫的一些著名诗篇，都不是产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恰恰相反，正是出现在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为什么会

产生这种社会经济衰落而文学发展的特殊的不平衡的状态的呢？我认为这仍然由于政治斗争的激发和影响，同时也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孕育，如果没有前一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那末，要在残破的衰败的经济基础上开出灿烂的奇葩来，也是不可能的。

治文学史，要注意“通”和“变”。司马迁写《史记》，旨在“通古今之变”<sup>①</sup>，章学诚说：“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sup>②</sup>“通”，就是要求我们去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找出文学本身的从源到流，找出各种文学形式的从源到流，找出各种文学题材的从源到流的发展规律，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就象流经祖国大地的黄河、长江一样，有它的发展的源头，有它的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气流贯，有它贯穿始终的东西的。文学史的研究，就是要通过对大量的历史材料的占有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去详加分析，从客观的实际材料中去找它的发展规律来。“变”，就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着也都是在变化着，文学在它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通”和“变”是辩证的关系，能知其“通”，就要能知其变，因为在“通”的过程中就包含着“变”。如果只知道“通”而不知道“变”，那末他们知道的“通”，也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而至于根本还不曾“通”。反之，要知道“变”，就必须知道“通”，因为“变”是在“通”的过程中的“变”，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如果连“通”都不曾做到，那末，“变”也就无从说起了。这里我们虽然都是说的抽象的“通”和“变”，但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抽象的“通”和“变”，“通”和“变”都是具体的，只要结合文学史的发展

过程细加考察，这种“通”和“变”的关系自不难理解，这里就不再罗列事例了。

文学史，离不开对作家的评论，而对作家的评论要做到恰当，确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有些思想和经历比较复杂的作家，更不容易取得一致的看法。我认为对作家的研究和评论存在的这种矛盾，完全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重要的是要下功夫进行深入的研究，拿出新的成果来，不要停留在一般的讨论上。对一个作家或一个作品提出一种能吸引人们普遍进行讨论的观点来，比起那种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的文章，作用要大得多。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sup>③</sup>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然是最好的概括。但是，任何一种新的科学的理论的确立或进展，一般来说，都必须经过斗争的过程，只不过斗争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显而易见，一种新观点，哪怕是确确实实的科学的真理，它要取旧的谬误的观点而代之，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一种谬误的观点，当它在一定的时期里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要它自动地让位于新的科学的观点，那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们不是要求学术界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和平共处，而是要提倡百家争鸣，提倡争辩，真理是在同谬误作不调和的斗争中发展的，究竟是谁掌握了真理，不是看他的地位高低，也不是看他的文章写得有多长，而是看他的理论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评论作家和作品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作家作品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倡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研究问题，那种离开了作家所生活的特定的历史范围去要求作家，给作家定框框，戴帽子，贴标签的方式都是无济于事的。在评价作家



和作品的问题上，过去左的和右的片面性都是存在的，在对某些作家或作品的评价上，右的片面性还较突出，但两者比较起来，还是左的片面性较严重，苛求古人，对古代作家和作品否定过多，片面地强调作家作品的思想性，而不重视总结研究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一谈艺术性，就被看作是鼓吹资产阶级观点或修正主义观点，真有点谈“艺”色变的形势，这种情况很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也不利于学术工作的发展和提高。现在必须把这种错误的倾向纠正过来，要大胆解放思想，充分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学术上如果缺乏自由和民主的气氛，学术就会窒息，思想就会僵化。“四人帮”的统治，就是这种高度窒息的活生生的事例。

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离不开考证，我认为应该为考证工作恢复名誉。其实，考证是一种手段，是学术工作上的调查研究，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过去常常把考证工作与“烦琐”两字联系在一起，似乎凡考证必“烦琐”，其实何尝不是如此。考证就是调查，在调查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要绝对避免烦琐，也是很困难的。如果烦琐的结果而弄清了问题，解决了问题，这总比说空话要好得多。当然，我并不赞成烦琐，相反我主张文章是要写得简要清通的，我在这里只是说考证工作的必要性，在做考证工作的过程中，往往很难避免烦琐。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文痞姚文元，在其咬牙切齿，竭尽全力地攻击周扬同志的那篇黑文章里，对考证工作，曾狠狠地打了几棍子，他质问说：

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

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好家伙，考证了曹雪芹的卒年、宗祖等等，就是唯心论的复辟，罪名大得很！大家清楚，曹雪芹是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奇光异彩的伟大作家，他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崇高地位，全世界有多少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有多少专家在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他的不朽巨著，人们听到关于他的哪怕很小一点点的新的资料的发现，都要津津有味地去议论它，研究它；但是这样一位为我们国家民族带来了这样崇高的荣誉的伟大作家，我们却不知道他生于何年、死于何年？不仅不知道，而且连想去知道、努力去探求它都不行，都成了“复辟”的罪状。不仅如此，我们竟还连这位作者的上祖的籍贯和历史也还弄不清楚，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因此红学家们曾进行过考证，但是一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和他的祖宗，罪名也就立即来了，姚文痞的棍子劈头盖脑地打了下来。要了解我们这位伟大作家的生卒年和祖宗，怎么也成了罪状了呢？

当然，当前的红学研究，我主张应该致力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世界观和美学理想，作者的创作方法，《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等等。但是做为对于作者的生卒年、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文物等等的研究，正是有利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而不是相反。

研究文学史，就需要脚踏实地地认真做好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工作。一切结论，应该从大量的客观资料中归纳出来，而不应该先定一个框框，先定一种结论。“四人帮”的御

用班子里发出来的汗牛充栋的文章，都是阴谋文艺、影射文学。他们根本不要材料，更不用说从大量的客观材料里去归纳出结论来了。因为历史的材料对他们旨在篡党夺权的阴谋和杜撰出来的荒唐“理论”不利，所以他们根本不能要材料。我们应当奋然而起，扫除“四人帮”的残余文风，大胆提倡说真话，提倡调查研究，提倡根据事实，根据切实可靠的材料说话，提倡明辨是非，独立思考，提倡朴实的文风，坚决扫除那种帮气十足的帮八股，扫除那种空话连篇，不要任何根据的旨在唬人和骗人的空头文章，坚决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材料统一的，持之有据、言之有物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奋斗。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于承德避暑山庄

---

①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② 章学诚：《文史通议·释画》。

③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

## 目 次

序·····	1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	1
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11
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	17
试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	37
题材与思想·····	51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57
义愤出诗人·····	64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	67
司马迁的人物特写·····	109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148
论北宋前期两种不同的词风·····	160
论罗贯中的时代·····	188
关于伯夷叔齐的评论·····	205
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212
战斗的思想家——李贽·····	216
从古典文学中学习“简练”的技巧·····	237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	247
谈文章的说服力·····	258
文章修改难·····	263
从“新诗改罢自长吟”说起·····	267
结构·描写·风格·····	270
——读《项羽本纪》	
叙事·议论·抒情·····	284
——读《张中丞传后叙》	
情与景会，情在景中·····	291
——读《岳阳楼记》	
意在言外·····	297
——读《醉翁亭记》	
后 记·····	302

##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

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如何正确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柳鸣九同志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再谈阶级分析的方法》，见《文学遗产》第470、471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柳文中的有些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讨的，特别是他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是不符合原著的意思的，因此提出来与柳鸣九同志商榷。

### 阶级的思想家和作家与本阶级的关系

#### “一般”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吗？

柳鸣九同志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说过，在一个阶级的内部，分为阶级的一般成员与“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的“阶级的思想家”这两部分人，他们说：“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敌视便会自行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3页）

柳鸣九同志接着对上面这段引文分析道：

这里指的是阶级的思想家与本阶级的一般关系，当然，也适用于阶级的作家与其阶级的关系。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即一，阶级的思想家与本阶级的一般成员之间往往是存在着某种对立，而这种对立并不使阶级思想家不成其为这个阶级的思想家；二，阶级思想家与本阶级的对立，总是要服从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也就是说，根本上是不可能违反这个阶级的利益的，是不可能以损害本阶级为其最后的结果的。

这两点启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作家作品与其阶级的关系。

我们认为柳鸣九同志对上引经典著作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他所提出的两点“启示”是与经典著作的本意根本相反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把柳文所引经典著作原文前面一段有关的文字补引出来，然后再加说明。

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

内部，……(下接柳文所引“这种分裂甚至……”那段文字)

我们把被柳鸣九同志舍弃的这段文字与他所引用的那段文字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柳鸣九同志歪曲了经典著作的原意。第一，经典著作是说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思想家与“另一些人”形成一种分裂，“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显然，这里是说阶级的思想家与“另一些人”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而根本不是说“阶级的思想家与本阶级的一般成员之间往往是存在着某种对立”。把阶级的思想家说成“与本阶级的一般成员之间往往是存在着某种对立”，自然也就大大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另一些人”的范围，因为阶级的一般成员，自然是指阶级的普遍成员而不是指部分的或某一些成员，这样自然也就根本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思想家与“另一些人”“对立”的实质<sup>①</sup>。第二，柳鸣九同志把经典著作中的“另一些人”改换成“本阶级的一般成员”以后，又随心所欲地把“本阶级的一般成员”改换成“本阶级”。这样，阶级的思想家、阶级的作家与“本阶级”便成为“往往是存在着某种对立”和“敌视”，而且这种“对立和敌视”，还是阶级的思想家、阶级的作家“与本阶级的一般关系”。这样，就无异等于说阶级的思想家和作家，“一般”不是阶级利益的捍卫者，不是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是阶级利益的反对者、破坏者了；这也无异说，阶级的思想家和作家，“一般”是超阶级和反对本阶级的，是不为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是反对本阶级的政治的，这样的观点，怎么能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呢？

柳鸣九同志说，根据他的“这两点启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某些作家作品与其阶级的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对经典著作的曲解，是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作家作品与其阶级的关系”的。举例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作家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难道他们往往与本阶级处在对立地位的么？难道他们不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倒是在破坏这种利益么？当然，我们知道上述这些作家对封建社会里的腐朽现象和黑暗政治确实是作了较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的，甚至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有所批判的，这些批判对劳动人民来说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有利的；然而他们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语），而不是为了鼓动劳动人民起来革命，因此他们仍然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因此他们批判的调子，除少数人表现了某种愤激的情绪外，其中大多数只是“半是哀怨、半是讥讽”，甚至有些人或有些作品，还只是“低声细语地说出一些不祥的预言”。因此他们的批判与来自敌对阶级的批判根本不同。诚然，柳鸣九同志是举了斯丹达尔作为例子来说明他的理解的，我们认为斯丹达尔的例子并不能帮助他说明问题，因为举例子首先要符合经典著作的原意，把经典著作的意思根本歪曲了，这个例子怎么能帮助他说明问题呢？何况斯丹达尔尽管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作了尖锐的批判，然而，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更坏一些”，他又“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了的东西”了。因此，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批判看作是他与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对立和敌视”；对本阶级的“对立和敌视”，只能是阶级的叛逆者，而决不能是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在中国，鲁迅是本阶级的彻底的叛逆者，所以他就不再是封建阶级利益的辩护士，而相反却是它的破坏者，是